

从贫穷到富裕： 晋江的现代化之路

陆学艺 朱 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 陆学艺 朱 明

副主编： 魏子燾 龚清概 吴明哲 张其仔

编 委： 刘树勋 黎 昕 陈长庚 黄陵东

陈文亮 傅家栋 许仲谋 龚维宾

张大伟

序

《从贫穷到富裕：晋江的现代化之路》这本书，是我们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和晋江市委、市政府的同志的集体创作，经过共同努力，终于付梓。从开始筹划到成稿，历时一年多，但我们对晋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从那时开始，我们目睹了晋江的历史性巨变，正是这种巨变鼓动了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写一本记录和探讨晋江成功之路的著作。

晋江籍作家许谋清写过一部小说，设想一位中国农民去问上帝，中国富起来需要多长时间，上帝摇摇头说，他这一辈子是看不到了。凡是从70年代走过来的人，回过头想想当时的情形，我们相信，谁也不会想到仅仅20年，晋江就摆脱了贫困，走向了富裕。这对很多西方学者来说是个疑问。我们虽然和这种生活比较贴近，并从全国的变化中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但一直不能把它解释得清楚。通过这次的进一步调查研究，我们不仅把晋江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过程基本搞清了，而且在这本书中把它记录下来，作了一些分析，基本的结论就是：晋江20年的变化，是“大传统与小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晋江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中央政策的变化，得益于中国有改革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又离不开晋江的地方传统，离不开地方政府和百万人民的创造性劳动。晋江的实践证明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

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晋江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深表感谢。我们特别要感谢朱明书记和龚清概市长，他们在百忙之中，对这次调查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作出了恰当的安排。我们还要感谢原办公室主任许仲谋先生、现任办公室副主任吴明哲先生、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庄祖奇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他们具体安排了这次调查工作，并对书稿的写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

本书是集体创作的成果。福建省委党校的魏子熹、傅家栋、陈文亮、程丽香分别撰写了第三章、第四章、第二章和第一章，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黎昕撰写了第五章，国家行政学院的龚维宾撰写了导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其仔撰写了附录一，附录二、三分别由晋江市委书记朱明和市长龚清概撰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张大伟撰写了第六章。我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曙光和编辑范广伟、张力之先生，这本书同样凝聚了他们的辛勤劳动与智慧，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得以付梓是不可想象的。

陆学艺

目 录

序.....	1
导论：“大传统”、“小传统”与晋江地方经济的发展.....	1
一、晋江的地方传统.....	2
二、地方传统的复兴.....	12
三、晋江模式：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作用的产物.....	22
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的晋江（1949～1978）：体制性贫困.....	26
一、改革开放前晋江并不具备起飞的经济基础.....	27
二、体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	34
第二章 制度创新（1979～1985）：大胆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45
一、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新时期农村现代化的起点.....	45
二、乡镇企业的起步与发展：联户集资企业的崛起.....	57
三、农村工业化初期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76

第三章	向工业社会迈进（1986～1991）	81
一、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完善与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综合开发	82
二、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90
三、	加强城镇和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腾飞创造条件	101
四、	农村现代化由物质的和体制的层面推进到文化的、精神的层面	107
五、	弘扬“晋江精神”，树立晋江的精神支柱	118
六、	农村工业化初展风貌	131
第四章	撤县建市效应（1992～1995）：一次新的飞跃	139
一、	4年近三番：世人瞩目的速度	142
二、	以城市化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46
三、	奔小康、建新村：夯实城市化的基础	174
四、	大发展、大变样	194
第五章	由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1996～1998）： 开始第二次飞跃	199
一、	新目标、新战略	199
二、	乡镇企业走向规模化、高优化、外向化	205
三、	农业产业化和综合开发	214
四、	科技进步与教育发展	220
第六章	现代化前景展望：晋江市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建构	242

一、	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相关因素分析.....	242
二、	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与途径.....	252
三、	城市建设与发展.....	259
四、	现代社会的展望.....	265
附录一	社会网络与经济生活世界的关系：西滨镇跃进 村案例研究.....	272
附录二	晋江的成就与经验.....	291
附录三	晋江跨世纪5年的宏伟目标和基本任务.....	300

导论：“大传统”、“小传统”与晋江 地方经济的发展

近20年来，晋江以超常的速度发展，创造了“晋江模式”、“晋江速度”和“晋江精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97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189亿元（1990年不变价）、工农业总产值322.72亿元（1990年不变价）、财政总收入7.4828亿元，分别是1978年的8.31倍、135.14倍和50.7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5257元，是1978年的92.23倍。综合经济实力居福建省“十强”县（市）之首，1994年跃居全国百强县（市）的第15位。农业总产值1997年达到9.82亿元，是1978年的8.53倍。1997年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395亿元，村财收入平均54.63万元。到1997年止，已有85个村成为宽裕型小康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全市199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40.5%。截至1997年，有12家企业被农业部确认为全国大中型乡镇企业，企业集团44家，省名牌产品11个。在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晋江已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发展成为一个以工业为主、初具规模的珠链式侨乡城市，正在走向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

晋江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了在特定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晋江人

民，晋江人、晋江各级政府以特有的方式充分利用三中全会所带来的机遇，创造性地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现代化，走出了一条符合晋江实际的农村现代化道路。晋江文化是晋江发展的内在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则是晋江发展的外在条件。正是这个外在条件，调动了内在因素，给内在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一、 晋江的地方传统

（一） 晋江文化的起源

所谓文化，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凝聚起来的生活方式之总体，包括人们的思考方式、社会心理、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方式。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了人类就有了文化，它体现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中。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是人类创造历史成绩的总和，“凡是由人类调适于环境而产生的事物，就叫文化”。由于人类生存的环境有差异，因而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思考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也就不会完全相同。从大的范围看，东西方文化就存在差异。因此，文化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差异性，同一范围内的文化又具有层次性。一个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定时间，形成之后就会相对稳定，形成一个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又不是封闭的，随着环境的变化这个系统也与外界不断地进行交流，接受不同层次或外来文化的挑战，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交流与交融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现象。

晋江文化产生于晋江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是在历史中生

成和发展的。晋江地处封闭的“东南山国”的闽南沿海。福建省西部有绵延不断的崇山峻岭，东北、西南走向的武夷山横亘于闽、浙、赣三省交界。总体上呈封闭构架的地理环境限制了与中原文化的传通。据考证，在距今7000年以前晋江已有人居住。春秋战国时，在晋江流域生活的人为闽越族，他们陆耕海渔，已能制造陶器和青铜器。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汉族大批南下。相传来到晋江一带的中原士族见其地风景类似洛阳家乡，故将这条当地最大的河流命名为晋江，以寄托对故乡的怀念。从晋到唐，南下晋江的汉族民众越来越多，于唐开元八年设立县治。外来的中原汉文化与先民们创造的闽越文化在晋江这块土地上交流、碰撞、融合、衍化、发展，成为今天的晋江文化。

（二）晋江文化的特点

晋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带有自己的地域特点。晋江文化是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结合，在晋江这个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古老的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遇到环境的挑战，作为文化主体的晋江人不断应战从而产生了晋江文化。汤因比认为，推动文明不断生长的内在机制是对原有文明的“最适度挑战”。挑战与应战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晋江人民为了生存由农耕向海洋贸易发展，由于贸易的发达进而带动手工业的兴起，使晋江具有悠久的商业和手工业传统。商业与手工业的勃兴与发达，使晋江文化表现出与中原文化主体不同的特点。晋江文化从历史中走来，其特点由其创造和承载传播的主体——海内外晋江人——体现出来。

1. 由“差序格局”而形成的爱家、爱乡和爱国精神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我们社会中最重要

质。”“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因此，中国由个人、家庭、家族、邻居、家乡、祖国等一圈圈地由近及远地推出去，在这个亲疏有别的大小不同的圈子中家庭、家族、邻居以及家乡则是相对亲密的圈子，而其中尤以家庭和家族为甚。

福建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最为兴盛和完善的地区之一。据陈支平先生考证，这一现象实源于北方士民在早期的迁居过程中遭到当地闽越土著的顽强反抗，因而必须以宗族的实力作为后盾。“在渡江南迁的过程中，他们每每统率宗族乡里的子弟们，举族、举乡地移徙，在兵荒马乱的恶劣环境和交通困难的条件下，加强了相互扶助，巩固了血缘关系”，“所以在福建的聚落形态，其名为坞、堡、屯、寨者多，这正是北方士民入迁福建时的那种浓厚的军事战斗的性质在聚落形态上的反映。在这些屯、堡、寨、坞中，有的为一村一姓的村落，也有一村多姓的村落，从而形成了相当牢固的聚族而居的社会习俗。”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家族制度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生存的需要，以家族的形式来达到单个家庭无法达到的目的。刘易斯·科塞认为，群体在遇到外部冲突时，群体的凝聚力会因此而得到加强。这种冲突具有正功能，使群体更加团结。在与不同族体或不同群体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加强了家族之间的联系，从而使中原文化的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在边远的闽越之地不但没有失传，反而更加兴盛，而且这种传统文化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仍有相当影响。现在很多文化现象在其发源地——中原——已经销声匿迹或者大大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3、24页，三联书店，1985。
参见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社会与文化》，第11页，转引自裘思著：
《晋江精神探索》，第94页，人民出版社，1995。

弱化，但是在后生的晋江却能见到并有一定市场。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不少民宅中，其正门右匾上刻有自己姓氏郡望和祖先来处，如王氏“开闽传芳”、李氏“陇西衍派”、陈氏“颖川衍派”、曾氏“龙山衍派”、林氏“九牧传芳”、郑氏“荥阳衍派”以及“鲁国传芳”、“鹤山衍派”等等。为争夺对地方社会资源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家族之间的对抗和械斗现象在晋江历史上十分普遍，60~70年代还有“农业学大寨，打架学陈埭”的说法，宗族之间械斗时有发生。80年代以来，家族活动在闽南地区十分活跃，这些活动包括修祖坟、建祠堂、祭祀和修族谱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泉州地区2340个行政村中，各类宗祠总数已达5000座以上。”

晋江是著名的侨乡，侨眷、侨属占全县人口70%以上，在海外的晋江人与在国内的晋江人的数量大体相当，甚至还多。海外华侨保持着晋江的文化传统，“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有大批的晋江人出海谋生，形成了今天3个100万晋江人的局面。在300万晋江人中，国内有100万人，港澳台有100万人，海外还有100万晋江人。“隋唐时期，已有个别晋江籍商贾、僧人出外经商、弘法，可谓晋江华侨之先驱。但定居海外而成为华侨者，稽之史籍，当始于宋、元，盛于明、清及近现代。” 100万晋江华侨遍布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在东南亚各国，而以菲律宾最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次之。海外华人聚居较多的地方一般都成立同乡会。例如，在马来西亚各地，凡晋江籍华侨、华人聚

贺东航：《晋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因：1970年代至1990年代》，第32页，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论文，1998。
吴泰主编：《晋江华侨志》，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居较多的州市都建有晋江会馆，1977年各地的晋江会馆联合组成“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总会”。晋江籍华侨在菲律宾华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在菲律宾华侨社会中，晋江籍华侨同乡会是以乡、村为单位来组织的，从最早于1910年组创的西滨同乡会到80年代，晋江籍华侨、华人在菲律宾的同乡会一共竟多达85个。另外还有宗亲会，例如，在菲律宾不仅有单姓的宗亲会，还有多姓联宗组成的同乡宗亲组织。晋江人宗族观念浓厚，有些小宗亲会因人数较少，往往尽量吸收所有族人包括其他村落的宗亲参加，以增强该组织的力量。从本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仅在马尼拉的晋江籍宗亲组织就近200个。同乡会、宗亲会有利于华侨之间联络感情，增强力量，增进福利。按照1958年由28个宗亲会代表组织成立的“菲律宾各宗亲联合总会”的宗旨：“联络全菲华侨、华人各姓宗亲会之感情，力谋团结，发动全侨力量，推行固有道德，转移社会风气，促进菲华福利。”另外，晋江华侨还在侨居地传播中华艺术、兴办华文教育、创办华文报刊以及承传宗教习俗。海外华侨之间一方面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操守着民族和地方文化，另一方面与家乡保持着密切联系，特别是那些家属仍在国内的华侨，他们大多以侨汇的形式赡家立业。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华侨都有一段辛酸的历史。尽管他们以自己的勤劳智慧为侨居地的开发和繁荣呕心沥血，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们却遭到各方面的欺侮、压榨，乃至惨遭杀戮。经济上，华侨往往承受着繁重的不公正税赋，财产得不到保护，有些华侨的财产被当地政府抢劫、没收。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欺凌、驱逐华侨的事件时有发生。本世纪以来，在菲律

宾、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排华浪潮。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仍然沿袭了原荷兰殖民者的排华政策，多次掀起反华、排华浪潮，1959年、1965年、1980年、1998年发生了4次大规模的排华事件。1998年5月，大批印尼华人不仅家产被洗劫一空，大批华侨惨遭杀害，而且令人发指的是还有大批华人妇女遭到强暴。华侨生活的这种不稳定性加强了他们与祖国、与家乡的联系，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感。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文化具有整合和维模的功能。由于文化的强大维系力量，使得300万海内外晋江人具有强烈的内聚力。侨胞们身居海外，心系家乡，胸怀祖国，对祖国的兴衰、家乡的安危、人民的祸福非常关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能够同心协力、不折不扣地“捍大患，御大侮”；在和平时期，侨胞们积极为家乡建设捐资捐物，献计献策。

2. 由生存压力而造就的勇于开拓、敢冒风险的精神

从中原跋涉辗转迁徙而来的晋江先祖们，生存在环境完全异于故土的晋江流域。这里地处亚热带，雨量充沛，古代是“茂林深翳”，“皆虎豹猿猱之墟”，到处是深林丛竹，野兽出没，一片蛮烟瘴气，生存环境恶劣。经过大约400年的开发，晋江这个地方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到了唐初，人口增长到5万左右，生产力也得到不断发展，这时已开始有“人稠地狭”之感了。

晋江历史上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自建县以后，人口剧增，赖以生存的耕地日益不相适应。谢履在《泉南歌》中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为此，人们就“向山要地”，“与海争田”。五代诗人“晋江两岸趁春风，耕破云山万千重”的诗句，就是当时晋江人民辟山要地的生动写照。明代何乔远认为，凡有“埭”的地名，“皆古人填海而成之”。从泉州湾到

安海港，晋江含有“埭”的地名达19处之多，如苏埭、下埭、陈埭等等。埭田的修筑，使晋江的海岸线向前推进了几里、几十里。据统计，晋江历史上修筑的埭田多达125处。 晋江先民们在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还不断兴修水利。自唐以至南宋，晋江先后筑成尚书塘、仆射塘、六里陂、清洋陂、留公陂等水利工程，使大片斥卤之地变成良田。同时，在晋西南和中部丘台地带修建湖、塘60多处，以蓄水灌溉旱田。历史上留下来的以渚、塘、埭、陂、洲、湾、屿命名的村落、田洋和水利工程，原来都是海潮起落之所。 晋江先民们为了扩大生存空间，勇于开拓，自强不息。

晋江先民们为了生存不仅努力扩大耕地面积，实行传统的农业生产，而且还努力尝试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一方面开始重视引种双季稻，同时发展经济作物，进行农、蔬、果、副多种经营，直接向近海采贝，并以“网罟为耕耘”，发展渔盐业生产。另一方面，生存的本能迫使人们把目光转向海洋，向汪洋大海讨生活。人们开始挣脱土地的羁绊，利用南临海洋的优势，走向海洋，开拓海外贸易。从唐代开始，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国商人纷纷来到中国沿海经商。于是，当时的后渚港和湾海（今安海）港便由一个普通的港湾发育成为通海码头。晋江县城泉州（今鲤城）出现了“市井十洲人”的盛况，成为万商云集的国际性大市场。谢履的“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反映了晋江海外贸易的动因和概况。至南宋末年，泉州已成为“涨潮声中万国商”的世界一流大港。泉州成为国

《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晋江卷》，第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晋江市志》，第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

内外贸易的结合点，海外输入的棉花、棉布、象牙、玳瑁、珠玑、玻璃、异香、胡椒等商品经过泉州销往全国各地，国内的衣料、器物、食品、药物、杂物等多种工农业产品也通过各种渠道汇集于泉州，再转销世界各地。晋江商人在海内外市场上非常活跃，据秦观的《观海集》记载：“林昭庆，泉州晋江人也，尝与乡里数人相结为贾，自闽越航海，直抵山东，往来海中者数十年，资用甚饶。”

向大海挑战，向大海要生活，进行海外贸易，是需要勇气和胆略的，同时在与海洋的搏斗中也培养了人们的冒险、开发、进取精神。远海航运要求有高超的造船技术、驾驶技术，同时受海上航道、水文、气象特征和海岸地质、地貌、水文、气象等自然要素的制约，需要比农耕更复杂、更高级的知识，更成熟的理性和更灵活的应变能力。由于古代科技落后，人们不可能充分认识大海，只有冒险开拓，与大海拼搏以获得生存的机会。

晋江人的开拓、进取、拼搏、冒险精神在与地斗、与海斗、与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明初实行“海禁”，不许“携带违禁货物下海”，晋江诸港曾一度因此而衰落，占重要地位的对外经济贸易遭到严重破坏。然而，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的晋江人，在生存斗争的逆境中，不屈不挠，明的不行来暗的，海上民间私商乘机崛起。明朝中叶，晋江参加海上贸易活动的人，要比宋元时期更多更普遍，并涌现出一批新兴的自由海商，尤其是安平商人，在“走私”贸易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晋江的安海港由此而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私商贸易的最大港口。海上私商贸

转引自魏子熹等：《晋江的实践与启示——农村现代化的一种有益探索》，第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易悄悄兴起，一些受生活所逼的无业贫民，纷纷违禁出海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安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地。而到了清代，清政府为了消灭沿海抗清势力，实行“禁海”、“迁界”等政策，虽然晋江私商贸易受到沉重打击，但是晋江人并不甘心望着大海，坐以待毙，他们一批批以非法、民间的方式前往台湾、吕宋及南洋群岛等地谋生。

3. 由开放交流而形成的兼容并蓄、开放交流的文化
晋江的先民们一开始就遇到了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的碰撞，随着海上贸易的深入发展，异域文化不断撞击着晋江大地，而远航海外的晋江人也在不断接受异文化的洗礼。因此，晋江文化既具有中原古老文化遗风，又有外来文化相映交融的特色。

海上贸易的空前繁荣，使晋江县城既是贸易大港，又是文化交流的中心。外国商人及传教士把他们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传入晋江。在晋江同时出现了古老的道教、汉化了了的佛教，又出现了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中亚的摩尼教、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和欧洲的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自传共存的局面，泉州被称为古代世界宗教的博物馆。值得一提的是，摩尼教自唐代传入长安以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排斥道教以外的各种宗教，摩尼教无法在北方立足，有呼禄法师辗转福州和泉州传教。宋代福建摩尼教极盛。元代，晋江畚店村修建摩尼教寺——草庵，寺内供奉摩尼光佛浮雕的石坐像，像高1.54米，是世界是仅存的一尊古摩尼教佛像，现在成了摩尼教的标志。明代官方镇压摩尼教，但晋江民间信仰摩尼教的大有人在。

晋江宗教的多元格局，是晋江开放的结果，同时也是晋江人在开放中培养出宽容博大胸怀的表现。晋江语言的变迁也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人通过对晋江话的深入研究，发现了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在晋江话中有较多的外来语成分，词汇也特别丰